

收稿日期:2023-08-10

## 司马彪悲愤心态与《庄子注》创作考论

寇志强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司马彪是西晋史学家,本为宗室长子,有德有才,希望继承爵位却被逐出家庭,胸怀理想却一直得不到重用,坚守正义却身陷囹圄,其一生充满了悲愤。在此心境之下,司马彪希望借助《庄子》求得人生的解脱,所以对充满玄虚之言之《庄子》进行了整理注释。司马彪的《庄子注》以精于训诂著称,但《庄子》中许多话语常激起司马彪的共鸣,所以他时常借助注文表达自己的悲愤,如对不重名节玄学名士的讽刺,对统治者依托名教为奸恶的不满,对改变虚伪世风的真道的呼唤。

**关键词:**司马彪;《庄子注》;悲愤心态;玄学;求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2-01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以来新出《庄子》文献研究”(21CZX038)。

**作者简介:**寇志强(1988—),男,河南许昌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诸子学、庄子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2.026

司马彪(约247—约306),字绍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晋书》卷八二有传。作为史学家,司马彪长于历史史实的考证,曾借助当时新出土的汲冢竹书指出谯周《古史考》中有122处不当,并撰有《续汉书》《九州春秋》等史书,历史学证实求信的撰写原则对其影响至深。《庄子》属三玄之一,其自述撰写原则为“寓言十九”,与史学刚好相反。司马彪其实对玄虚之言没有太大兴趣,其《庄子注》云:“谓虚,劳人尿上生肥白沫也,皆为利欲感动,失其正气,不如深耕熟耰之有实。”<sup>[1]150</sup>他认为玄虚之言就像劳动人民尿上的泡沫,还不如具体的耕作实在,这无疑是对清谈家们的尖锐讽刺。既然司马彪对玄学没有太大的兴趣,那为何还要为充满玄虚之言之《庄子》作注呢?通过对司马彪生平思想进行深入考查则不难发现,其早年不幸被父亲逐出家庭,中年胸怀大志却仕途不顺,又因坚守正义而无辜入狱,其一生悲愤不平,所以与《庄子》思想心有灵犀,希望借《庄子》求得人生的解脱。司马彪撰写《庄子注》,与向秀、郭象等人借注文阐发玄学思想不同,其注文侧重于名物训诂,目的是探究《庄子》本义。司马彪在探寻《庄子》本义的同时,也受到庄子批判精神的影响,屡屡借助注文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

## 一、司马彪悲愤原因探析

### (一) 有德有才却被父亲逐出家庭

司马彪是司马睦的长子，司马睦在魏末被封为安平亭侯，魏晋鼎革之后受封中山王。作为王侯长子，司马彪显然也希望继承王侯爵位，他起字“绍统”便有继承统绪之意，显露出远大志向。司马睦是司马懿六弟司马进之子，虽与司马昭血缘关系较近，然无德无才，在魏末仅任七品的侍御史，官俸六百石。魏晋易代之际，正是用人之时，此官职并非核心官职，可见他并不受司马昭重视。而司马彪从小就笃学不倦，渴望有所作为，从而振兴自己家庭这一脉。司马彪的勤奋好学似乎得到了司马昭（或司马炎）的重视，魏晋易代之际，司马彪起家便当了骑都尉。骑都尉设置于汉代，乃是六品武官，秩比二千石，魏晋时期与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合称三都尉，有权定期参加朝会。骑都尉作为亲近侍从武官，地位特殊，一般由皇族、外戚子弟担任，负责监管羽林骑。司马彪起家为骑都尉，品级超过了自己的父亲，显然是司马昭（或司马炎）有意安排，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政权。司马彪起家便担任要职，可谓少年得意，其残诗“左揽又翠羈，右抚犀象鞍”<sup>[2]729</sup>，颇有曹植《白马篇》的味道，从中可看出司马彪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疑此残诗便作于任骑都尉之时。

可是好景不长，司马彪很快便失去了家族的信任，甚至还被父亲司马睦逐出了家庭，剥夺了爵位继承人的身份。《晋书》本传云：“好色薄行，为睦所责，故不得为嗣，虽名出继，实废之也。”<sup>[3]2141</sup>司马彪被司马睦剥夺了爵位继承人的身份，出为司马敏之后，而司马敏是司马懿的弟弟，不知何原因，司马敏一系更不显，《晋书·宗室传》都没有为其列传，可见名为出继，实际上就是废掉了司马彪，导致其最终只能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入传。对此，《晋书》本传轻描淡写地认为是“好色薄行”，显然这个理由并不能服众。“好色薄行”顶多算个人品行不端，不是大的罪过，也不足以影响政治前途。况且魏晋之际，儒家伦理观遭到了巨大冲击，虚伪造作、好色薄行、行为不端者比比皆是，未见因此受到处罚的人。司马睦本身也无德无才，还曾因私募八县逃民而违反中央政策，这比“好色薄行”的罪过严重得多，也仅仅是降为侯爵，很快又升为王，没有受到太大的处分。河内司马氏本身是一个保守的世家大族，司马睦通过一点小事情就废掉在朝中担任要职并且才华横溢的长子，而立一个道德、才学、身体远不如长子的次子，这殊难理解。司马睦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这样做，那就是司马彪犯了重大政治错误，导致其不得不废掉司马彪，从而保全自己，故笔者疑司马彪所犯之错很可能是政治上的重大错误，导致其失去了家族的信任。《晋书》本传在写到司马彪著史动机时说：

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sup>[3]2141</sup>

司马彪著史目的是为了“教世”，为了昭著忠臣义士，以达到劝恶扬善的目的，这也是他一贯坚守的价值观。反观魏晋易代过程中，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三代的阴谋、权术、虚伪都与司马彪一贯的价值观相悖。司马彪虽属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但年少轻狂发表一些与统治者有悖的言论也是很有可能的，或许这便是《晋书》“薄行”的注脚。另外，司马彪的弟弟司马蔚无德无才，并且还早卒，显然不能撑起整个家庭，而司马彪笃学不倦，有德有才，是个理想的继承人，这也从侧面说明司马彪所犯的错误比较严重，所以司马睦才下狠心将其逐出家庭。鉴于司马彪一生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晋书》本传所谓的“好色薄行”或许只是借口。

被逐出家庭的司马彪内心充满愤懑，其残诗云“泛泛江汉萍，飘荡永无根”<sup>[2]729</sup>，此诗托“萍”

自喻,感慨自己被逐出家庭后飘荡无根的无奈。另一首残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愤懑:

百草应节生,含气有深浅。秋蓬独何辜,飘遥随风转。长飏一飞薄,吹我之四远。搔首望故株,邈然无由返。<sup>[2]729</sup>

此诗托“蓬”自喻,表达秋蓬无辜,没有做错什么,却不得不随风飘扬,而当望见自己当初寄生的故株时,还是心有所动,但是却没有办法回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司马彪被逐出家庭之后,时隔多年,司马睦家仍刻意与之保持着较远的关系,这绝非普通的送子出继。“秋蓬独何辜”,也暗示了自己被逐出家庭的无辜,错并不在自己,但自己却无力改变现状,只能表达随波逐流的无奈与愤懑。司马彪在《庄子注》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愤懑,其云:

其子灵公。司马以“其子”字绝句,云:“言子孙不足可凭,故使公得此处为冢也。”<sup>[1]1551</sup>

此句感叹原墓主的子孙不可靠,导致坟地被卫灵公占据,毫无疑问映射着对自己被父亲逐出家庭后,弟弟因病早亡,家族无法绵延不断的不满。总之,终魏晋之世,河内司马氏整个家族内部一直处于阴谋篡权、争权夺利的循环之中,而司马彪在道德、才华等方面无疑是整个家族的佼佼者,同时也是家族的另类,这或许就是其与整个家族格格不入、并且郁郁不得志的一大原因。

## (二)渴望有所作为却郁郁不得志

经历了人生重大变故之后,司马彪开始专精学习,不预世事。魏晋鼎革之后,晋武帝鉴于曹魏灭亡的教训,开始大肆分封诸王,同为宗室的司马彪却好像被遗忘了一般,直到泰始(265—274)中期才得到了秘书郎的职务。秘书郎亦是六品,品级并无变化,但却由有实权的要职变为管理书籍的闲职,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经此世变之后,司马彪常郁郁不得志,他并不甘心做一个秘书郎,仍胸怀理想,渴望有所作为,所以多次写作诗文给山涛,希望对方能够推荐自己,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山涛以善于识人著称,在西晋时期为朝廷举荐了大量人才,他在泰始十年(274)回到京城,并在咸宁(275—280)年间先后担任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尚书仆射、侍中等职务,“前后选举,周遍内外,而并得其才”<sup>[3]1225</sup>。司马彪看到山涛为朝廷举荐了大量人才,走投无路之时也只能致书山涛,希望得到举荐。

今存有两篇司马彪致山涛的诗,一篇致山涛的文,都是表达自己不甘现职、渴望有所作为的愿望。其中一首《赠山涛诗》残句云:

翩翩野青雀,受性孤且微。昔生三河侧,鼓翼帝王畿。<sup>[2]728</sup>

司马彪以野青雀自喻,表示自己本性孤高,却身处低微贫贱之中,但是自己并非生来便是如此,昔日生活在三河侧时,也曾在帝王身边飞行。晋代以河内、河东、河南三郡为三河,司马氏出自河内郡,司马彪以此暗示自己是宗室子弟,也曾受到帝王的重用,希望山涛能够举荐自己。另一首《赠山涛诗》云:

苍苍椅桐树,寄生于南岳。上凌青云霓,下临千仞谷。处身孤且危,于何托余足。昔也植朝阳,倾枝俟鸾鹭。今者绝世用,倥偬见迫束。班匠不我顾,牙旷不我录。焉得成琴瑟,何由扬妙曲。冉冉三光驰,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抚剑起躑躅。感彼孔圣叹,哀此年命促。卞和潜幽冥,谁能证奇璞。冀愿神龙来,扬光以见烛。<sup>[2]728</sup>

此诗开头便以椅桐树自喻,它上凌青云霓,下临千仞谷,有绝世之姿,暗示自己有德有才。它曾经也面向朝阳,也有鸾鸟与鸾鹭依枝而栖,然而现在却处身孤危,绝于世用,像公输班那样的巧匠路过也不回头,俞伯牙、师旷那样的乐师也不用来做乐器。此句暗示自己曾经也受到帝王信

任,担任要职,但现在失去了信任,处身艰难,无人重视自己。作为椅桐树,其使命便是被做成琴瑟,让人弹奏出美妙的乐曲,暗示自己也有着高洁的品质,却不被认可,只能虚度时光,但自己并不安于蹉跎,仍有着高远的理想,仍愿为国所用,希望像山涛这样的神龙能够慧眼识珠,举荐自己,让自己发挥出应有的光芒。其中的“冉冉三光驰,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抚剑起踟躅。感彼孔圣叹,哀此年命促”六句,表达了时不我待、急切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他的《与山巨源书》残句曰:

根枝失据,托命此别。告求矜愍,许见赈恤。穷人易感,悲喜兼怀。承命之后,情过挟纩。<sup>[4]144</sup>

此文以“根枝失据”表示自己失去了家族依靠,走投无路,只能托命于山涛,祈求山涛能够帮助自己。而“穷人易感,悲喜兼怀。承命之后,情过挟纩”表明山涛已答应帮忙,这让司马彪非常高兴,并向山涛表示谢意。从这三篇致山涛的残诗残文中可以看出,司马彪对时任职务非常不满意,他不愿意蹉跎在秘书郎这样的闲散职务上,而是渴望建功立业,金石留名,从中也可以感受到司马彪走投无路、郁郁不得志的悲凉心境。司马彪另有一些诗歌残句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境,如:

秋节良可悲,百华咸萎落。堂前柳随风,疏林树萧索。<sup>[2]729</sup>  
烈烈玄飏起,粲粲繁霜凝。劲风回白雪,长川激素冰。<sup>[2]729</sup>

这两首残诗皆以秋冬时节万物肃杀来衬托自己的悲凉抑郁心境。山涛以善于品鉴、发现人才著称,而司马彪德行兼备、熟悉礼法和历史典故,所以山涛答应举荐司马彪。司马彪在此后只担任过散骑侍郎之职,散骑侍郎属五品官,官职升了一级,而其职责是掌侍从左右,顾问应对、规劝得失。司马彪知识渊博,熟悉历史典故,这个职务看起来很适合司马彪,但也并非其理想所在,在西晋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也不可能有一番作为。

### (三) 坚守正义却无辜入狱

司马彪还曾身陷囹圄,此事《晋书》本传未载,《晋书·郭舒传》云:“郭舒,字稚行。……始为领军校尉,坐擅放司马彪,系廷尉,世多义之。刺史夏侯含辟为西曹,转主簿。含坐事,舒自系理含,事得释。刺史宗岱命为治中,丧母去职。刘弘牧荆州,引为治中。”<sup>[3]1241</sup>郭舒在任领军校尉之时,擅自释放司马彪,被廷尉治罪而失去了官职,然却得到了世人的称赞。可见司马彪并没有犯罪,其身陷囹圄属于冤枉,所以引起了为人正直的郭舒同情,宁可违法也要释放司马彪。此事《晋书》没有系年,此后刘弘牧荆州是在太安二年(303),郭舒为刘弘治中是守母丧之后,而古代守母丧一般为三年,那么郭舒为宗岱幕僚的截止时间当在永康元年(300)。由于郭舒为夏侯含、宗岱幕僚的时间长度未知,故郭舒释放司马彪之事在元康(291—299)初期的可能性较大。元康初,晋惠帝继位后,贾南风为了掌握政权,一手策划了多场阴谋,先后杀死杨骏、卫瓘、司马亮、司马玮等辅政大臣、强势藩王。贾南风掌控政权之后,暴戾日甚、荒淫放恣,并且宠信宦官。司马彪此时任散骑侍郎,职责是侍从左右、顾问应对、规劝得失,难免会对贾氏倒行逆施的行为有所不满,或许此次入狱便与此有关。至于具体过程,由于史书未载,已不可详考。

综上,司马彪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宗室长子,笃学不倦,有德有才,骑都尉的起点也很高,也想要有一番作为,但不知何原因,失去了信任,导致其被逐出家庭。从少年得志,到失去信任,甚至被逐出家庭,人生巨变导致司马彪的内心充满了愤懑。晋朝建立后,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变,司马彪仍不被信任,仕途不顺,所以不断致书山涛,希望山涛举荐自己。元康年间,又无辜而身陷囹圄。司马彪一生悲愤不平,最终只能以著书名世。《续汉书》《九州春秋》《庄子注》都是司马彪的名世之作,但由于长期悲愤,司马彪对《庄子》更为情有独钟,希望借助《庄子》来求得人

生的解脱,所以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整理注释《庄子》。

## 二、借《庄子注》以抒发悲愤

曹魏末年,司马氏掌握政权之后,宣扬以孝治理天下,实际上是利用名教铲除异己。面对此种情况,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庄子的那种宁肯‘曳尾于涂泥’而不愿‘留骨而贵’的姿态,很容易引起他们精神上的共鸣”<sup>[5]</sup>。竹林名士将兴趣从《老子》《周易》转向《庄子》,《庄子》成为他们对抗现实的精神武器。至晋初泰始年间,向秀《庄子注》开始流行,“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sup>[6]180</sup>。清谈活动重新兴盛起来,《庄子》已成为清谈家们最重要的话题来源。面对日益流行的清谈活动,司马彪则是冷眼旁观,他对《庄子》的兴趣,不是因为其当时最为流行,而是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导致与之心有灵犀,希望借助《庄子》排遣心中的悲愤。因此,司马彪在注释《庄子》的时候,与自己撰写史学著作时保持一致原则,依然侧重于文本内容的整理、语词典故的训诂、庄子本意的探寻,受当时盛行的玄学影响较小。虽然撰写原则与向秀、郭象等人不同,但《庄子》里高蹈独立、睥睨权贵、批判社会的精神对司马彪还是有着较大的影响的,所以司马彪也常常在名物训诂的同时,零碎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如对不重名节玄学名士的讽刺、对统治者依托名教为奸恶的不满、对改变虚伪世风的真道的呼唤。

### (一)对不重名节玄学名士的讽刺

西晋时期玄学的过度发展,给传统儒家伦理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进而也影响到了现实政治的正常运行。西晋清谈领袖王衍,身为三公之一,却不理政事,整日吟咏谈玄。在王衍影响下,西晋清谈之风异常盛行,擅长清谈便能声名鹊起,如郭象,本是寒门出身,在王衍组织的一次清谈活动中大放异彩,便得到王衍等当权派的重视。这种社会风气还严重影响到了政治,王衍“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sup>[3]1236</sup>。在王衍等人的影响之下,官场上形成了以不论世事、雅咏玄虚为上,以勤勉做事为下的政治生态。东晋史学家干宝在总结西晋灭亡教训时云:“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sup>[3]136</sup>清谈的过度流行改变了社会风气,使得社会重虚荡、放浊、苟得、望空,轻视传统价值观中的名节、居正、勤恪。玄学的过度发展,对传统儒家伦理观冲击越来越大,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对,如裴頠(267—300)“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sup>[3]1044</sup>,遂撰《崇有论》,反对王衍等人所提倡的玄虚之风,提倡实学。

司马彪作为传统价值观的坚守者,对玄学的过度发展忧心忡忡,虽然精于《庄子》,但总体来看对玄学兴趣不大,其《庄子注》不仅较少阐发玄学思想,反而批判虚无的玄学,其云:

膏。谓虚,劳人尿上生肥白沫也,皆为利欲感动,失其正气,不如深耕熟耰之有实。<sup>[1]1550</sup>

此文出自《庄子·则阳》:“故鹵莽其性者,欲恶之孽,为性萑苇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并溃漏发,不择所出,漂疽疥癰,内热溲膏是也。”<sup>[7]899</sup>庄子本是谈论性情与欲望的关系,认为欲望会拔除人的本性。郭象此处注云“此鹵莽之报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齐其至分”<sup>[7]900</sup>,也是发挥庄子观点,谈论性情。而司马彪却不谈性情与欲望的关系,转而批判玄学。在司马彪看来,许多清谈者并非是为了探讨学术,而纯粹是为了利益,因为擅长清谈者很容易声名鹊起,许多投机之徒为了利益,企图以谈玄的形式来博取高名,失掉了为人之正气。清谈派领袖王衍,表面上脱俗,但背地里却争权夺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乃以弟王澄为荆州刺史,以族弟王敦为青州刺

史，自号为“三窟”，遭到时人鄙夷。王衍兵败被俘后，非但不思其过，“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sup>[3]1238</sup>，为保命而劝羯族首领石勒称帝，毫无节操可言。又如西晋玄学理论集大成者郭象，依靠清谈名声大著，被东海王司马越引为太傅主簿。郭象擅长清谈，本应为高逸之士，但任职后操弄权柄，“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sup>[3]1397</sup>。可见许多清谈者言行不一，只是把清谈作为博取功名的工具，并非真心服膺，所以司马彪对那些无德而靠清谈虚名入仕者非常不满，也对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

与热衷清谈的所谓“名士”相反，司马彪坚守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却一直不为统治者所重视，最终仕途蹭蹬，困顿失意。由于长期失意，司马彪甚至也会对自己坚守的名节有所怀疑，如：

《庄子》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司马彪曰：“勿修名也。被褐怀玉，秽恶其身，以无陋于形也。”<sup>[8]1084</sup>

此文出自《庄子·养生主》，本意是谈论善恶与刑名的关系，郭象注也是如此，其云：“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也。”<sup>[7]116</sup>司马彪却抛开了《庄子》原文，专门来探讨名节问题。传统伦理观对名节极为看重，但司马彪却激愤地说不要去修名节，修名节就如同穿着粗布衣服却怀揣着美玉，世人只看你的外表，无人重视你的内心，因外表会对你秽语相加。只有那些不重视名节的虚妄之士才能取得高官厚禄，而像自己这种重视名节的士人，只能身居草野，秽积其身。毫无疑问，这也是对自己坚守名节却不断被打压的愤懑。

## （二）对统治者依托名教为奸恶的不满

汉末三国时期，统一帝国崩溃，经学思潮衰落，诸子学再度流行，清谈内容由经学转向玄学，尤其是竹林名士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后，传统的儒家伦理观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在西晋时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士人的抛弃，但司马彪仍坚守传统伦理观，其《续汉书》对传统礼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其撰写史学著作的目的就是“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司马彪在《庄子注》中表达了传统儒家伦理观的重要价值，其云：

五帝之所连。司马云：“谓连续仁义也。”<sup>[1]1497</sup>

连连。司马云：“谓连续仁义游道德间也。”<sup>[1]1461</sup>

《庄子》曰：“缘督以为经。”司马彪曰：“缘，顺也。督，中也。顺守道中，以为常也。”<sup>[8]283</sup>

司马彪认为传统伦理观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从五帝以来，社会发展之所以绵延不绝，不是因为政权没有变化，而是因为传统的伦理观没有变化。如“五帝之所连”，郭象没有注释，司马彪认为五帝时代相连续靠的是仁义这样的传统价值观。传统价值观除了仁义之外，还有中道，“缘督以为经”本是说养生需要打通经脉，而司马彪认为中道就是人的经脉，不可或缺。仁义、中道等传统价值观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不遵守仁义等传统价值观的人，便是畸人，其云：

畸人。司马云：“不耦也，不耦于人，谓阙于礼教也。”<sup>[1]1452</sup>

不遵守传统价值观的人便是方外之士，可谓“畸人”。“畸人”本指身体有残疾的人，而在司马彪眼中，不遵守仁义、中道等礼教的人便可谓“畸人”，即思想上有缺陷的人。司马彪坚守儒家传统伦理观，表面看来属于守旧的礼法派，但实际上司马彪与礼法派贾充等人格格不入。贾充等人无德无才，不仅悖逆弑君、结党营私，而且陷害忠良，其坚守礼法只是把名教作为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司马彪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想要请人推荐自己，首先想要的是名士派的山涛，而非礼法派的贾充。

在《庄子注》中,司马彪抨击统治者的虚伪,认为他们把名教作为维护统治的借口,其云:

仁义之愚。司马云:“谓依托仁义为奸恶。”<sup>[1]1563</sup>

且假夫禽贪者器。司马云:“禽之贪者,杀害无极;仁义贪者,伤害无穷。”<sup>[1]1544</sup>

司马彪在解释“仁义之愚”时说统治者“谓依托仁义为奸恶”,名义上是在维护名教,实际上只是以此为名义,杀害反对者,巩固权力。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昭宣称以孝治天下,并以此为借口杀死嵇康、吕安等名士,实际上就是以仁义为奸恶。在司马彪看来,禽兽中的贪婪者会为了自己的欲望残忍杀害其他禽兽,而统治者以仁义作为武器就如同贪婪的禽兽,危害性非常大。在司马氏篡夺和巩固政权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巨大的杀戮,如高平陵政变之后一日而“天下名士减半”,易代之际对嵇康、吕安等人举起的屠刀,西晋初期礼法派为了争权夺利对名士派的打击,八王之乱中士人的无辜死亡。每次政治斗争的胜利者都利用手中的权力,以维护儒家伦理观为借口而大肆屠杀,终西晋一世而不绝。司马彪在《庄子注》中反对依托仁义而滥杀无辜,表达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

### (三)对改变虚伪世风的真道的呼唤

魏晋时期,魏文帝“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司马氏在魏晋禅代过程中使用种种虚伪手段,阮籍、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贵无派王衍等人“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这些使传统儒家伦理观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世风变得虚妄、望空。于是西晋时期出现了种种乱象,如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为了获得名士的名誉“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sup>[6]22</sup>,贵族子弟为了名誉“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sup>[3]820</sup>。这种虚诞之风在朝廷内部也盛行,不理朝政被视为高雅,勤于政事者被称为俗吏。

面对这样非正常的社会环境,司马彪力图发掘《庄子》思想中的“真”,并借此纠正当时社会的荒诞之风。“真”是《庄子》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在现存《庄子》之前的先秦古籍中,‘真’这个字几乎从未见使用”<sup>[9]</sup>,直到《庄子》书中才开始大量使用起来。据统计,《庄子》33篇中有19篇出现了“真”这一概念,共出现了66次。据徐文研究,“真”在《庄子》中通常借助“真人”“真知”“真性”这三个概念展开。而司马彪却将“真”与“道”相联系,提出“真道”的概念,其云:

玄珠。司马云:“道真也。”<sup>[1]1478</sup>

禹。司马云:“冷,晓也,谓以真道晓语禹也。”<sup>[1]1516</sup>

《天地篇》云“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sup>[7]414</sup>,司马彪以“真道”注“玄珠”,认为黄帝之道就是“真道”。《山木》云“舜之将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缘,情莫若率’”<sup>[7]686</sup>,司马彪认为舜将死之时,传禹之道也是“真道”,而舜的“真道”实际上也是来自于黄帝的。“真道”如同儒家的中道、仁义等思想一样,也是五帝以来连绵相传的价值观。其实儒家传统伦理观中没有“真”,但司马彪将之与仁义、中道等儒家传统伦理观相提并论,就是为了提高“真”这种价值观的地位。司马彪为何如此看重“真”呢?“真”的对立面便是伪,司马氏的统治充满了虚伪,西晋社会虚诞之风盛行,所以司马彪真诚地呼唤“真”,希望以“真”来改造西晋社会虚伪荒诞的世风。

综上所述,司马彪少年得志,但很快便失去了统治者的信任,从有实权的骑都尉变成了闲职的秘书郎,此后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在玄虚盛行、政治派系斗争激烈的大环境中,司马彪一直坚守传统价值观,独立于党派斗争和各方政治势力之外,甚至不免银铛入狱。政治上的屡屡受挫导致其长期郁郁不得志,热衷谈玄的社会环境又与其长期坚守的价值观相悖,加上被逐出家庭、隔

离亲情的无奈,司马彪内心充满愤懑,所以转而借注《庄子》寻求精神解脱。注文是表达思想的窗口,郭象在《庄子注》中用玄学为当朝的士大夫寻找心灵上的依托,王叔之在《庄子义疏》中为隐士寻求一己之解脱。而司马彪的注文,虽以名物训诂为主,但庄子睥睨权贵、激烈批判社会的思想时常与司马彪形成共鸣,受其影响,司马彪也将自己愤懑之情注入《庄子注》中。可惜其注文的训诂学成就过于突出,世人只注意到其训诂,而忽略其思想,再加上郭象《庄子注》的巨大影响力,导致其《庄子注》在晚唐时期亡佚。透过今所残存的一些佚文,仍可以感受到司马彪悲愤的心态。

#### 参考文献

- [1] 陆德明. 经典释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严可均. 全晋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童强. 嵇康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91.  
 [6]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刘孝标,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  
 [7]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61.  
 [8] 萧统. 文选[M]. 李善,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 徐克谦. 论庄子哲学中的“真”[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2):93-98.

## A Study on Si Ma Biao's Mentality and His *Annotation to Zhuang Zi*

KOU Zhiq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Si Ma Biao was a famous historian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266 - 317). As the eldest son of the noble family, he had great virtue and talent, but was banished from his family and deprived of his title and privilege. His grief and indignation was reflected in his *Annotation to Zhuang Zi*, in which he sought relief and condolence. His elaborate interpretations were inspired by Zhuang Zi's insightful observations, such as satirizing the infamous metaphysical scholars, condemning the treacherous and greedy rulers who professed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denouncing the hypocrites.

**Key words:** Si Ma Biao; *Annotation to Zhuang Zi*; grief and indignation; metaphysics; seeking truth

〔责任编辑:王建霞〕